

中国学者评说

[编者按] 此文是对拉尼冈《交流学：学科百年进路》的回应与评述。

从传播学到交流学：一种符号学的路径

胡易容

“交流学”^① 是承继符号学和现象学理论的传播理论传统。相对于传统意义的主流传播学，它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它在北美发展起来却非实证，而是自我定位为一种“质”的研究的“人文科学”；它广涉“文化分析”却并不提供法兰克福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它还深入分析人类符号行为的各个层面，并提供实用指导^②；它与经验学派有着共通的理论原点和几乎同样时长的发展历史，但并未受到热捧。其自我命名 *communicology* 也还尚未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接受。

当今，后“大众传播社会”现状对理论模型提出了新的要求，“交流学”及其背靠的符号学理论，从不同侧面提供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③ 的理

① 基于其对信息的双向性侧重模型，同时也为了沿袭 ICI (International Communicology Institute) 自身的中文名，我们称为“交流学”。然而从其理论工具来看，可以理解为“符号形式的传播理论”。

② 其分支之一“临床交流学”(clinical communicology) 是“对交往行为病理性失调的医学矫治”。

③ [美] 赫伯特·金迪斯等《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论包容度，很好地契合了当下高度符号化这一时代现实，或将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点。

一、从“communication”的界定看传播学与交流学的分野

1. 历时的考察：communication 词义衍义之旅

当人们谈论“传播学”时，常将其等同于“大众传播学”。然而，“传播学”既非必然单向也非必然是大众的，甚至未必是借助“技术化的媒介”的。从词义发展来看，communication 从来多义而各自相安。可考的最早词源是拉丁词 *communis*，意为“普遍”。形演化的中间阶段还包括古法文词 *communicacion* 这一“行动的名词”^①。15 世纪后，communication 的现代普遍意涵基本确立。其涵义超过十种，常见的包括“会话、通讯、交流、交际、交往、参与、分享等”^②。而技术化的引申到 17 世纪才开始显现。此后，communication 的狭义化一路朝着“技术化、大众化、单向度”发展^③。

可以看到，communication 狭义化的四百年历史，也是大众媒体兴起的四百年。1605 年荷兰的《安特卫普新闻》和 1609 年德国的《通告：报道或新闻报》(*Avisa Relation Order Zeitung*)^④ 开启了报业近代化的进程。媒介技术间接导致了 communication 一系列语义的变化。一方面，传输规模更大；另一方面，传输向度更为单一。这种大规模单项为主的信息传输形态特点进入 20 世纪后被广播和电视发挥到了极致。中文词“传播”之蕴涵中强烈的单向播撒意识恰好与此接轨。而“传播学”的学科名称也据此建立了从名称到范畴的合法性^⑤。这一合法性的前提是对 communication 的多义进行界定。有

①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3.

②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③ 最初，随着工业化技术飞速发展，communication 作为“工具性、技术性的承载与运输”的抽象名词，应用于“公路、铁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通讯技术”。引自同注①，p. 73.

④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⑤ 威尔伯·施拉姆在他奠基性著作《传播学概论》开篇即谈到了一种尴尬。哲学家肯尼斯·伯克 1935 年向出版社送去一部著作，他提议用《传播学概论》作书名。出版商否决了这个书名，说读者看到 Communication（传播）这个词会以为是论述电话、电信的书！这就是伯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定名为《永恒与变化》的经过。

学者搜索出 126 种关于传播的定义^①。因此，后来者要以 communication 为对象进行研究，必须对自身的领域及范畴进行界定。

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意义永远在集体使用中像珊瑚那样死去并堆积成未来使用者的起点（赵毅衡语），或者干脆说，一个符号的意义就在于他的使用（维特根斯坦语）。communication 的狭义化伴随着技术媒介的强势进入而发生，但这一术语的衍义之旅远未终结。

2. “communication”的学科名及其中国化

新的衍义之旅在媒介形态的聚变中重新起航，并进而可能对“传播学”的意义产生新的影响和扩充。随着 web2.0 的深度发展，“网络媒介”已成为一个前现代思维下的名称。赛博空间构筑的网络社区是一个多中介信息分享与共享平台，而这一平台在信息传输特质上是结构上无中心、信息流向上无向度、身份上无传授鸿沟的虚拟社区。这一状态使得具有更强大能指分节优势的汉语词汇“传播”遇到了更大的问题。

英语本身具有“分享、共享”或“互动”的意指。只是这一意指此前一直受到大众传媒时代的语境压力。这种意指在整个社会从大众传播媒介主导向互动信息共享模式过渡时自然得以呈现。“传播”在汉语中使用充满了“单向度”、“一对多”、“传者主导”的大众传播模式意味^②。而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名称，研究者认为应更多赋予其“分享”及“互动”的含义^③。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过细的能指分节导致的结果是，必须以其他词汇予以重新命名^④。“交流学”这一学科在中国长期未受到应有的瞩目，与此中术语不对称不无关系。一直有声音认为，考虑到上述英文词本身具有双向交流的含义，应将 communication 翻译成“交流”、“传通”、“沟通”等。据说，中国最早引介传播学的专家余也鲁先生原来也反对将 communication 翻译为“传播学”，而应翻译成“传学”或“传意学”^⑤。事实上，“传播”的译名所带来的

① Stephen W Littlejohn, Karen A. Foss,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in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2008, p. 3.

② 如《北史·突厥传》：“宣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高适》：“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为传播吟玩。”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一砚一铔，主人俱绘形作册，传播艺林。”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消息立即传播开了。”

③ 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此类情况在英汉词汇对应中相当常见，如 uncle 相当于汉语中的叔叔、伯伯、舅舅。

⑤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

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规约的力量以另一种社会话语的语用逻辑压倒语义逻辑。传播学被广泛应用并制造了与“交流”一词的距离感。“交流”被面化为“人际”、“个体”的意义。国内交流学的意义均趋向于此。具有代表性的是吴建民先生的《交流学十四讲》与关世杰先生的《跨文化交流学》两书中都专门说明，“交流学”就是“communication”。但是，这种应用层面的“交际”不能全面反映本文所谈到的理论形式的“交流学”。

3. 从“communication study”到“communicology”

在英语世界，术语也在演进。“communication”因其多义性而难以定义，每个研究者必须在具体语境中界定其意义。常用的“communication study”直译是“传播研究”。但从构词法来看，communication study作为一种学科名称的严谨性与各种经典学科似有差距。基于此，约翰森（Wendell Johnson）、诺尔（Franklin H. Knowler）等学者先后在1958年前后提出，以“communicology”这一名称来统一存在于各个领域的交流现象（或传播现象）。约翰森认为，这一称谓显示出能够建立一个共通领域的可能。且可以结合具体的应用环节生成诸如“口语交流学、文学交流学、电话交流学、大众媒体交流学”^①。

从语言逻辑来看，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communicology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过程却远未完成。以中国国内文献为例，对communicology不多的引述可见邵培仁先生的《传播学》，其中在介绍传播学的概念时标出了对应英文（Communicology或Communication Science），并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又称传学，传意学等”^②。在邵培仁先生看来，communicology就是传播学^③。从字面上来看，

① Wendell Johnson (1906-1965), "Communicolog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Dorothy W. Moeller, ASH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peech and Hearing Association] 1968, vol. 10, pp. 43-56.

② 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认为该词为Franklin H. Knowler所创。根据Lanigan的文献*Communicology: Approaching The Discipline's Centennial*, Wendell Johnson于1958年更早使用该词。见Wendell Johnson (1906-1965), "Communicolog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Dorothy W. Moeller, ASH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peech and Hearing Association] 1968, vol. 10, pp. 43-56. 在ICI的网站上将二人视为共同贡献者“Common originary attribution of the term *Communicology* is to Wendell Johnson (1958) and Franklin H. Knowler (1962)”, 引自<http://www.communicology.org/content/encyclopedia-archiv>

③ 蔡曙山教授的简介中，作为ICI (International Communicology Institute) 成员的相关信息为国际符号交际学院院士，引自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网站：<http://rwxy.tsinghua.edu.cn:8001/psy/readnews.do?id=731>

communi 与 ology 词根的组合完全可以称为传播学,但是,一方面为了尊重作为“communicology”这一名称的发明组织 ICI 的自我称谓^①;另一方面,也由于从这一学派传统来看,目前“交流学”还并不能囊括传播学的所有范畴,而只是“以符号学基础对各种人类交流行为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将来,随着 communicology 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传播学其他分支的进一步接轨,被称为“传播学”也未必不可。本文遵循国际交流学会网站的中文名的惯例,称为“交流学”。

二、交流学与传播学:概念与方法、传统与流派

1. 交流学的基本概念、范畴

根据 ICI 定义,交流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其学科研究对象为人类交流行为,而其学科方法论则是应用符号学与现象学方法解释全球文化中人类意识与行为的话语呈现。其研究对象被界定为人类交流话语中的四个网络层次:(1) 自我交流层次(或精神病学、美学领域的概念);(2) 人际交流层次(或社会对象领域的互动);(3) 群体层次(文化与规范领域的事务);(4) 跨群体层次(举止与实践跨文化领域的实践与举措)。它包括相关的应用性子学科^②。如(1) 艺术交流学(Art Communicology),对于各种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审美的研究,尤其是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如电影、舞蹈、民间故事、音乐、图像学、绘画;(2) 临床交流学(交流病理诊断)(Clinical Communicology),一种治疗研究,主要针对语言病理学和听觉病理方面的交流失调,以及语言表达和使用方面的错误导致的误解的矫治;(3) 媒介交流学(Media Communicology),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电子媒介、影像、通信和视觉传达等语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分析;(4) 交流哲学(Philosophy of Communicology),在形而上学、认知论、逻辑学、美学的哲学分支领域里,为了解释语言与语言学、认知科学、控制论而在更宏大语境下对交流进行研究。

^① ICI 于 2000 年成立美国的“国际交流学学会”(英文名 International Communicology Institute,简称 ICI),是交流学学术传统的倡导者与推广中心。该学会的学者对近百年历史的“交流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并自我界定中文名称为“国际交流学会”。引自 <http://www.communicology.org/>

^② 引自 <http://www.communicology.org/content/encyclopedia- archive>

2. 在传播学科发展史中定位“交流学”

正如研究符号学的历史必然回到索绪尔的语言学课堂，回顾传播学史则必然回到新闻学科的建立^①。以新闻学为起点的传播学已经走过了沧桑的百年，其间，它见证甚至直接参与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浩荡的变革和最血腥的屠戮——社会主义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成为显学。这种地位，显然是由于飞速发展的传媒及其带来的信息传播行为深深地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传播学正在脱离其对母体新闻学的依赖，并反过来对新闻学这一母体提供学理支持。这表明传播学正在走向成熟。然而传播学内部所呈现出来的分化是巨大的。这些认知上的差异是当今传播学流派与传统因其假设不同所导致的判断不同。这就是老生常谈的传播学的基本流派的构成。笼而统之，可以称为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北美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学界通常认为，这两种流派，从理论假设到工具手段是截然不同的。本文要追问的是：这种差异是流派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吗？这种对立是学科内在逻辑的分野吗？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点？它们与“交流学”关系如何？

历史地看，他们之间的确有着共同许多共同性。

a) 交流学传统与传播学经验主义传统的“同源”

法国著名传播学家贝尔纳·米耶热将传播学的各种研究传统看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大传播学奠基学科的演化结果。这三种传统分别是控制论模式、经验—功能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语言学^②。随着传播学学科的极大拓展，此后的门类复杂性远远超过最初的预计，且难以用一种维度实现归类。在利特尔约翰的《人类传播理论》中，接受了克里格（Robert Craig）模式，归纳了传播学研究的七大传统：（1）符号学；（2）现象学；（3）控制论；（4）社会心理学；（5）社会文化；（6）批判；（7）修辞学^③。

从方法论来看，“交流学”源自胡塞尔现象学传统和卡西尔符号学理论，

① 1908 年，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设立了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系。1912 年，根据美国新闻界传奇人物普利策的遗愿，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引自（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

② 贝尔纳·米耶热此后倾向于社会心理学派和麦克卢汉学派称为专门的学派。见段鹏编《传播思想与文化工业：访法国传播学教授贝尔纳·米涅》，《传播学在世界》2005 年第 1 期，第 43 页。

③ Stephen W Littlejohn, Karen A. Foss,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in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2008, p. 39.

萨皮尔和雅克布森在其方法论模型方面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及奠基作用。“交流学”与经验学派共同的学科奠基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利特尔约翰这七种传统框架中，“交流学”几乎同时是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的综合。这七大传统的划分较好地描述了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路径，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作为一种分类，其分类标准并非完全基于方法论。例如“批判传统”本身只是立场，而“社会文化”则是对象。此外，传播学学科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源头之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趋向于更宽泛的语用符号学，并转而为传播学的其他分支提供了理论支持。新传播思潮（la nouvelle communication）将格雷戈里·贝特森看作先驱。而身为人类学家的贝特森是通过电影和摄影对巴厘岛上父子关系中的非语言行为展开研究的^①。

随着传播学学科体系日渐丰富，归纳一方面变得更为困难，且常常易于形成一种过于简化的认知。然而，适当的归纳却极其必要。美国传播学家约翰·菲斯克在他的《传播学研究：符号与过程》（*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将传播学所有的研究划归两大阵营：注重过程的效果的流派与注重意义交换的符号学流派。此种说法仍不免过分简化，但一个巨大的作用是矫正了以往两分法将批判作为经验对立面的逻辑错位。他抛开立场的问题，回归方法论，探讨传播学研究路径。此外，这种二分还提供了很大的认知便利——显然“交流学”正是菲斯克所谓的注重意义交换的符号学派的典型。

b) 整合趋势与学术传统的互渗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菲斯克的二分法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认知上的便利，更在于它暗示了人类学科发展在分化中重新整合的趋势。这种趋势从另一个角度带来了对于交流学这种“符号形式的传播理论”的利好消息。因为符号学的跨学科特质给予了这种理论一个跨越边界的空间。

亚里士多德以“是之是”为理论之普遍性本体，开启了学科分类。此后的理论家从未停止过对分类的努力。虽然分类学（taxonomies）并不直接提供经验世界的直接解释，并因而不被许多学者接纳为一种“科学”，但它内在地包涵了解释世界的维度与角度。我们力图用边界清晰的概念界定延续不断的世界，以至于我们往往忽略了，被建构的细分后面那个从未断裂的世界的

^① 转引自（法）贝尔纳·米耶热《传播思想》，陈蕴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连续性和整体性。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以来，人类分工的高速发展驱动了学科专业高度细分，这种分节导致的误解更为明显。事实上，学科之间充满了渗透与相互跨界的张力。斯宾诺莎用几何规律研究伦理学，斯宾塞用生物有机体来看待社会，日前兴起并广受争议的“迷米学”（meme）无非是道金斯的追随者们将他“自私的生物基因”借用到了对文化和社会的解读上。

回到传播学本身，传播学的史前史也并非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边界分明的批判或是经验实证。枚举欧洲学者的学说可能不具有说服力。美国经验主义杰出代表、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者、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人罗杰斯（Rogers, E. M.），在他极负盛名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中，从19世纪的三个欧洲大师——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入手分析传播学的思想起源。他认为，传播学1900年以后在美国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欧洲理论的影响。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通过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被深深地植入传播学的北美研究传统之中^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心理学有强烈的影响，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②。

可见，批判或是经验并非始于两种传统的来源，而是同一根源下发展道路的分野，是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巴别塔演绎。实证主导的传播学在美国被形容为“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上”，这足以说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传播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可以推而广之，在发生学意义上对某种学术传统的生成进行更简明的归纳。例如，根据技术论，媒介的发展根本性地造成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工业化和商业集团本身也可归结为媒介技术发展结果，因此，它们的影响无非是技术的间接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北美和欧洲不同的土壤中分别滋生了传播学中的“效果维度”

① 对传播学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的罗伯特·帕克，他不仅影响了美国本土的实证主义传统，也作为哈罗德·英尼斯的老师直接影响了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形成。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提到了传播学至今仍在研究的论题：媒体内容怎样影响公众意见？大众媒体是怎么被公众意见影响的？大众媒体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改变？人际传播是怎样与大众传播进行联系的？参见[美]罗杰斯（Rogers, E. M.）《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② [美]罗杰斯（Rogers, E. M.）《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页。

和“反思维度”^①。

可归纳的事实是，学派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学科边界所能触及的所有边界，而是该学科在更为宏大的社会诱因作用下具体的生成：资本主义体制和美国的政治模式、选举文化以及社会赞助的研究模式形成了以效果为导向的“经验学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应用与宣传学的传播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几乎直接导致了“宣传技术”与“控制论”^②的诞生与应用；战后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欧罗巴这块思辨的土地上长出了所谓“批判的传统”；飞速发展的媒介技术下的种种社会奇观点燃了麦克卢汉的神思，并延展成为整整一个迥然不同的新学派。这些闪亮的学派以最终被选择的方式构成传播学这一学科“组合轴”（Syntagma）。但这并不否定深刻的“聚合”（Paradigm）背景，甚至，作为聚合内容的投影，它们恰恰是对学科其他路径的一种外在遮蔽。从学科发展的应然或可能性角度来看，我们应时刻对新的可能有所准备。由此，暂时放弃百年学科制造的眼花缭乱的迷局，回到人类“交流”或是“传播”的审视中，可能更具洞见。至于学科名称——“交流”抑或“传播”——无非是能指分节在不同语境下的一种呈现方式。

结语：意义与过程、融合与分化

——“复杂”中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

李普曼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信息符号构成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麦克卢汉则认为，所谓信息世界不过是一个“由媒介延伸的感官所触及的世界”；或者干脆，如 Charles Pearson 所说，18 世纪是物理的世纪，19 世纪是化学的世纪，20 世纪是生物电子的世纪，21 世纪也许就会成为符号的世纪。对于这是一个何种世界的言说自我预设了一种视

① 前者的具体成果包括拉斯维尔斯的宣传分析（拉斯维尔斯首先是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兼政治学家，他在一战中开始了对宣传的技术研究，1927 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被视为奠定西方大众传播研究体系的开始；二战期间，他更是与拉扎斯菲尔德、卢因、施拉姆一起对传播学深入的应用传播学进行了实用性研究）。而前面提及的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经济力量扶植了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以“广播研究项目”为代表）。这些成果的路径虽然经过了社会学的转化（托洛·阿尔托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但其路径依然明晰。参见 [美] 罗杰斯（Rogers, E. M.）《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

② “控制论”的诞生与维纳参与提升二战高射炮打击准确度有关，他的研究报告“黄色险境”发表为《以工程应用来推断插入与平整静止的时间系列》，为控制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参见同上。

角。既然我们注定被置于一个只能见影的柏拉图洞穴，既然我们早已在巴别塔的空间距离发生了言说的隔膜，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现状的基础上理解世界。一种全知的视野本身可能是无知的象征。我们从未彻底摘掉有色眼镜，因为那将一无所见。每一种学派的价值在于它在自身有效范畴内展现出的解释力和逻辑自洽性。对于传播学而言，“交流学”研究传统所秉持的符号学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传播行为的重要模式。“传播”与“符号”这两个关键词以何种方式结合，其结果可能会给整个传播学理论格局带来一些变化。

交流学传统将 2022 年确定为学派的百年华诞^①。这种传统是否适合称为一个学派也许可以讨论^②，本文更侧重基于一种学理应如何看待一种研究方式的前景和可能。未来十年无疑将是理论与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剧烈变动的十年。抛开“交流学”或者“传播学”的狭隘话题，我们可以进入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学科融合中看待“人文”、“社会”、“科学”这些基础字眼。这些传统之间截然不同的理论假设恐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固若金汤。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③并非一种横空出世的箴言，其关于“复杂性”的论断恐怕只是人类对事物认知的巨大能量和巨大无知之间同样巨大的张力的体现。而传播学或者交流学本身的问题简单得多。对于学科内部分支与视角的互涉与分工，合与分永远是并存的力量，正如分子之间的张力，在某种外力作用下便生成了样态不一的“新物质”。人文与社会、自然科学更深入地结合时，并不否定各种学派与传统、方法与立场之间保持自我范畴的清晰界定并与其他学科保持一种必要的“紧张”来确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然而，研究对象本身是复杂的，任何过于简化的理论都有一种危险。请允许本文引用一段话来作为结语——

① 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主题，交流学的历史源头出现于 1922 年。当时，现象学之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英国伦敦大学用德语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在这些演讲中，胡塞尔将他的主要哲学论题解释为一种“先验的社会现象学，这种现象学映射出人与人之间意识主体交流的多重性”。这些演讲的重要性后来作为附录记录在目前著名的奥格登（Charles K. Ogden）和理查德（I. A. Richards）的著作中。该著作名为《意义之意义：语言对思想的影响研究与象征科学》（1923）。引自 Richard L. Lanigan, *Communicology: Approaching The Discipline's Centennial*, RAZoN Y PALABRA, 2010, p. 72.

② 借用美国式的框架来看，罗杰斯引述哈维的四个条件：（1）一个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2）一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置；（3）财政支持；（4）传播其工作的手段。参见 [美]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205 页。

③ [美] 赫伯特·金迪斯等《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想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

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不能简单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并取代简单性的东西。复杂性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词语，而不是一个提出现成答案的词语，它表明了世界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复杂性思想不能使我们避免和消除这个挑战，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迎接它，甚至驾驭它。

——埃德加·莫兰^①

作者简介：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yu813878@126.com

^①（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